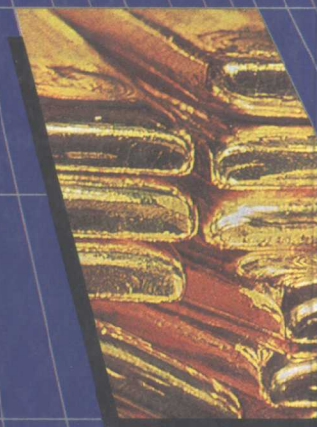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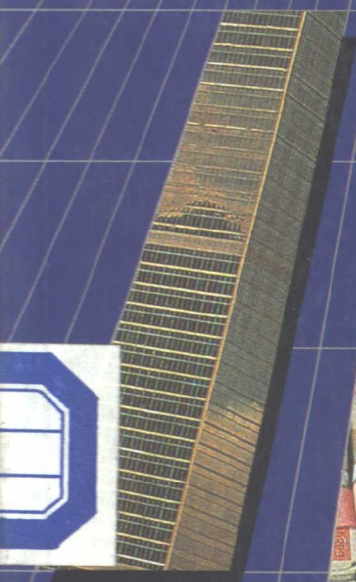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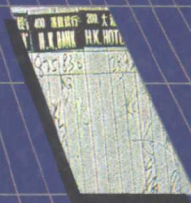


曾澍基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政治經濟學



香港政治經濟學

曾澍基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書名：香港政治經濟學

作者：曾澍基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發行：華風書局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4-186號 電話：5-749495

承印：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1985年4月初版

定價：港幣30元

書號：ISBN 962-226-084-5

獻給「港人治港」的 構思者與參與者

自序

收在這本集子裏的，絕大部份是我年多以來的報章專欄上以筆名發表過的短文。

香港是在歷史夾縫中發展起來的，因此要真正了解本地的政治經濟現象，必須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從我們周遭的大環境的變化來入手。自然，香港內部的一些獨特情況也不容忽視。

經濟現象無疑有其本身的規律和軌跡，不過在現實世界裏，卻又往往與政治互相作用，以至未能截然兩分。集子內的文章雖然主要是針對經濟問題，但筆者的分析架構，是遠遠逾出西方的主流經濟學的框框的。聰明的讀者應該察覺到，後凱恩斯學派、新馬克思主義以及第三世界的發展經濟學，對筆者的思路都有強烈的影響。

「港人治港」對中國是一個突破，對香港是一個契機。作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交接點的香港，其未來的發展將會充滿着刺激的挑戰，極受世界注目，其得失成敗的衝擊亦將大部份本地市民所想像的更為廣泛深遠。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感到幸運，能夠身處這個史無前例的實驗之中，另一方面，挑戰的壓力或許又會令我們在興奮之餘，有點戰戰兢兢。

現實方面既出現「意料之外」的突破，理論方面便不能停滯不前，無論我們意欲成為新現實的辯護士、批評家或是有原則的、積極的參予者，都應深入探討新的問題。雖然，這本集子裏的文章，離開理論創新甚遠，它們只反映出筆者認為可以邁進的方向而已。

曾澍基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錄

「港人治港」的第二步·····	1
誰在吃免費午餐？·····	9
最近修訂的滙率制度與香港經濟·····	13
「自由經濟」論的貧乏·····	17
市場與政府介入·····	21
固定滙率與黃金本位·····	23
香港經濟增長的動力·····	25
出口增長率有無反映港滙下跌？ ——有，悲觀主義者可以放心·····	27
私有產權、市場與道德·····	31
與「自由經濟」論者玩遊戲 ——看「無形的手」的非理性·····	35
什麼是「合理」的加薪幅度？·····	39
也談香港經濟繁榮的成因·····	41
是將財政預算現代化的時候了 ——側評彭勵治的第三度傑作·····	45
港府財政狀況有多壞？·····	49
港府陷入結構性赤字危機？·····	53
滯脹與政府財政赤字 ——有沒有文明的解決方法？·····	57
從「怡和震盪」談起·····	61
再談香港資本構成的外來化·····	65
地產狂潮與先知·····	67
從中國發展的長遠趨勢看港人治港的經濟位置·····	71
再談「港人治港」的經濟位置·····	75

從兩局團訪英談起

- 香港前途的政治經濟學 79

「鄧小平震盪」與惡性循環

- 再論香港前途的政治經濟學 83

市場與社會主義

- 一個令你驚奇的理論 87

計劃與市場的結合

- 饒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91

聯繫滙率制度的運作機能

聯繫滙率衝擊的教訓

金融震盪之後

資本主義往何處去？

香港經濟的短長線

綠皮書的代議三三制

- 一頭四不像、勢將早逝的怪物 117

代議制的政治經濟學

- 既非獨裁，又不民主，也無效率的三三制 121

政制改革對香港經濟的影響

- 「政治免費午餐」派的憂鬱 125

剝削與比較優勢

- 一國多制的理論問題 129

港元應固定還是浮動？

- 給「自由經濟」論者思考的材料 133

反民主的自由經濟主義

- 新右派的意識形態 137

產權，經濟與民主

港元應否改與一籃子貨幣聯繫？

政府介入作為社會合作	
——擺脫自由經濟的知識論	149
如何探索香港未來？	153
關鍵是生產的社會化	
——而非產權或交易費用	157
小型開放經濟的滙率及所得政策	161

「港人治港」的第二步

英人的「堅持」不外是談判棋子

「港人治港」方案，只是在原則上肯定中國必須收回香港主權，而管治權則應該由英國人處轉移到香港市民手中，嚴格來說，它還未有實質的內容。中國方面，最近亦通過了不同的渠道，表明除了保證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以及行政制度不變之外，其他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及政策性的細節，都會讓香港人自己來制訂。無論部份人士對國內決策層的諾言怎樣存疑，這種比以往開明得多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去支持和玉成的；反過來說，也只有當我們積極地和充分地利用這些由特殊的歷史契機所產生出來的自由的時候，「港人治港」的原則才可能真正貫徹。

到目前為止，「港人治港」還不過是一個提案，英國保守黨政府與香港擁英派、續約派和若干「用心良苦的民族主義者」，依然是希求爭取到在97年之後維持英人治港的現狀的，理由或基於既得利益、或出於恐懼、偏見、甚或因為缺乏自信和想像力。不過，照目前的種種蹟象來看，英國人的「堅持」不外是一個談判棋子，寄望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初則以主權換治權，繼而將以經濟實益來作為交取治權的價錢，道義責任也者，未標價的幌子而已。

故此，可以想像，在驗明中國對主權與治權的立場屬不可移易之後，英國人將退而求其次，除在公開談判盡力攫取利益外，還會

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作出部署，以確保於未來的「港人治港」制度內，有一定的擁英或利英力量，作為在港投資的安全活塞。另方面，社會上的其他各種團體及勢力，亦勢必要調整立場，重新調配物質和非物質資源，以及訂定過渡期的策略。

到其時，「港人治港」的倡議者和支持者將面對另一個難題：「港人治港」要予實質的內容。原則一關已過，具體細節的釐定便成為無可再推延的任務。況且，原則上既然肯定了「三不變」，97前後就屬一連續體，97之前不作出適當預備和安排，之後亦難以順利過渡。說「港人治港」是讓香港人管理自己，發揮民主精神，只屬抽象理論，難免書生意見之識，因為「港人」從來不是也將不會是一個同一體，這裏有官僚、資本家、工人、知識分子以至流氓無產階級，有英資、華資、美資、日資、德資和法資，亦有左派、右派、中立派、擁英派及無黨無派，品流極端複雜，而且除依附現存政治勢力者外，組織整合起來的並不多，特別是代表民間草根利益的所謂壓力團體，不幸地至今仍是視野局限、各自為政。故此，誰也不敢保證未來「港人治港」會否演變為「港官治港」、「港資治港」，以至「港共（親中勢力）治港」。單抽空地鼓吹「港人治港」而不去為建立一個有較廣泛參與的民主政體以及較合理化的社經制度作出努力，不提具體建議並通過組織行動宣傳來使這些建議獲得實現，老實說是有點不負責任。

擴大聯合陣營

民間的「制衡力量」的慢熱倒是可以理解的。最大問題在於未知因素太多，而改革的限制亦未容清楚介定，故此，單方面提出具體方案極易便招來什麼「天真」、「理想主義」及「一廂情願」的冷嘲熱諷。但實際上，各個政治勢力以及資本體系現已積極地展開部署及籌劃，「制衡力量」的猶疑和鬆散是略為使人擔心的。由於

香港的「十九世紀式政制」，長期剝奪了大多數市民的民主參與權利，政經資料又壟斷在一小撮行政精英及財團首腦手中，壓力團體早給人「缺乏社會整體分析以及提出正面殊途政策能力」的印象，就算各方面「自由地」按照本身利益爭取營造九七後的體制，「制衡力量」已處於相對地不利的地位。14年根本是一段很短的時間，何況在此期間內亦有極多的工作需要去做，看來「制衡力量」非快馬加鞭不可。其他勢力既已偷步，我們實在不必再作謙讓。

故此，對「港人治港」制度和過渡期策略的設想、分析以及籌劃應該立刻開展。各團體最重要的任務，很明顯是要擺脫狹隘的山頭主義以及被動的防守姿態，盡量擴大聯合陣線，並提出全面的體制及政策改革方案。如果未來「港人治港」的政制屬「半民主式」，甚或「大半民主式」（市議會只有少數議員委任），則政黨的出現實屬無可避免，坦白說，現時未有任何一個民間團體具備了號召組黨（不用說單獨組黨）的能力，而且參政不同爭取權益，廣泛地吸納各行業及各階層人士是任何有規模的公開政治組織成型的先決條件，那怕它是自由民主黨、社會黨甚或歐洲式的共產黨；成員層面的拉廣將有助於「制衡力量」擴闊視野和眼界，提高分析及製訂殊途制度政策的能力。

就九七之後「港人治港」的政經社法具體內容來說，「滙點」的朋友已經不為預料到的譏諷批評所嚇倒而提出了一個大綱，筆者對它沒有太大的異議，其他的組織亦陸續公開其意見及看法。香港前途問題非常複雜，未來的解決方案亦將屬「史無前例」，不運用點想像力簡直無法自處，我們只好向批評者挑戰：要他們拿出些既不「天真」、亦不「一廂情願」的方案來。不過，隨着時光的流徙，更具體更落實的建議自然會不斷出現，這點我們是不必懷疑的。況且，在很大程度上，現時所有有關「港人治港」的構想，都有「自行實現的預言」的意味，視乎預言者本身的行動而已。

但就九七之前的改革方案而言，分析和討論就更加少。這亦是

可以理解的，九七後是變局，九七前則屬英人統治的「現狀」，變更程度似乎有限。不過，正如上文所說，未來十四年內的工作是十四年後的準備，甚至是必需條件，而其他既得利益集團亦已開始部署，故此，對「現狀」進行深入的分析以及發展過渡的具體策略就顯得急不容緩。

過渡期的政治策略

退而求其次，英國人必然會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作出準備，以鞏固未來的投資利益。政治架構方面他們是佔了很大優勢的，由於決策權及資料的壟斷，要在過渡時期內培植一羣親英分子，以便未來於民主化了的架構扮演重要角色，應該易如反掌，資本集團與統治層的關係非常密切，代表它們利益的政客亦肯定會受到各種公開或不公開的支持及方便。經濟方面，滙豐、渣打在金融業的壟斷地位，經過了近年來港府政策的有意或無意協助（特別是金融三級制的設立及利率卡特爾制度的持續），已經更加穩固，英資以外的銀行雖然憤怒幾形於色，亦無可奈何。華資集團在七十年代向英資企業挑戰，但到目前為止，英資的領導地位仍未有被真正搖動，現有的資料顯示：以資產總值計，英資依然在金融業外的前列五名位置裏佔去四個（一）置地、（二）怡和、（三）太古集團、（五）太古地產，第四名的是華資的隆豐集團），緊握着地產、貿易及航空運輸等重要脈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英國政府擁有40%股權的大東集團從置地處購入電話股票的行動，這可能是英資加強控制公共事業的先聲。無論擁護英人治港的文化人怎樣危言聳聽，英國人對「港人治港」制度下維持資本主義制度還是蠻有信心的，他們現正遵從着那些神聖的「遊戲規則」來確立其龐大勢力。可以想像，這種趨勢若繼續下去，到1997後英資仍將在香港各個主要經濟領域佔據着壟斷性或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們當然並非鼓吹要排斥英國人或者親英分子。如果九七之後要實行民主（就算是不徹底的民主），任何「港人」（無論將來如何介定）都應有選舉及被選舉、進行政治活動和組織工作的權利，管他是親英還是親中，唯一「排斥」的方法就只有通過民主制度內公平競爭來進行。作為資本主義特區，香港亦會繼續向外資開放，理不得它們屬英資還是美資日資。不過，我們却大有理由反對統治者利用目前不民主的制度，來培植有利自己的政治勢力，來阻礙其他的階層及組合參與複雜的決策程序，積累經驗以及建立獨立的政治基礎；也大有理由反對各個行業內的壟斷，以及與社會必需有關的公共事業受到外資或私人的操縱。

故此，我們在過渡期的政治策略，應該是爭取在九七之前將現存的統治架構盡量民主化。區議會及市政局的功能及職權極端有限，作為民間力量小試牛刀的試驗場自然無妨，但（部份？）民選的立法局肯定應作為九七前的目標。只有這樣，長期受壓抑的中下階層才有抬頭的機會，到九七之時，與其他政治勢力和體系的距離才可拉近，一個有廣泛參與的「港人民主治港」的政制才具備真正的基礎。當然，正式權力架構之外，各階層的政治化及組織化，是同等重要的先決條件。

過渡期的經濟策略

至於過渡期的經濟策略，我們應在反對壟斷，鼓勵公平的自由競爭的同時，設法促進社會對經濟領域作出民主介入。以金融業為例，滙豐及渣打的壟斷地位，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是不健康的。佔據了達60%的存款基礎（在美國或英國它們老早便應受到政府的反壟斷機構所制裁），若果兩集團決定將資金大量遷移的話，香港的金融制度將遭遇極大的動盪，這種過度倚靠是香港發展成為健全的財經中心的重大障礙。三級制及利率卡特爾對壟斷傾向的助長以及在

效率方面所引起的弊端，已引起了愈來愈多的關注。解除三級制、利率由市場決定、營造自由競爭的環境，以及防止壟斷趨勢惡化（甚或將之逐步減弱），應是我們爭取的部份目標。不過，沒有一個代表香港整體利益的中央機構來訂定真正公平的「遊戲規則」，調協及監管各個金融機構，以確保競爭屬良性而非惡性，上述的目標根本難以達致；況且，為着未來經濟的全面發展，亦有需要加強政府的貨幣及金融管理能力，故此成立香港本身的中央銀行，以及擴大社會對有關政策的參與，應該是最合理的設想。

在其他經濟領域方面，原則亦大致一樣，這意味着公司法、投資法以及收購合併條例（法例）的修訂更變，意味着證監處、工商署和其他相關部門的改革以及反壟斷部門的成立，亦意味着政府的開支與稅務政策的合理化和民主化。為着達到資本結構的多元化的目標，我們亦應設法吸引各國的資本前來投資，以平衡目前偏倚的形勢。單就公共事業來說，我們應迫使政府在適當時候對部份公司收購某一比重的股權，並規定外資或私人集團控股的上限，以確保公共事業不為非公共勢力所操縱。

至於政府對經濟的長期性調協以及帶引工作，特別是針對香港的生產型態向資本及技術密集的過渡問題，幾乎已是老生常談。經濟學家、專業人士和企業家所提過的建議亦不勝枚舉。看來只有當統治架構真正地民主化，而政府的長遠目標又正式確立之後，這些建議才有被實現的機會。

要提出正面主張

最後，自然難免要討論一下分配與再分配的問題。毫無疑問，正如筆者在過往的文章裏早已指出：七十年代香港的「經濟奇蹟」並沒有帶來均分的傾向，堅尼系數由1971的0.44惡化至81年的0.45，這不過是其中一個顯示，但在「再分配」的層面，政府無論

是出於被迫（內在和外界的壓力）還是自願，的確是做了一些功夫，例如從72年到82年間，社會服務開支的平均年長約為32%，比本港生產總值的21.4%為高，是公營部門相對體積由15%升到目前的24%的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筆者絕不懷疑即使經過「再分配」措施之後，香港的貧富階層之間的財富及收入比例依然非常懸殊（特別是財富方面，根本就未有過什麼「再分配」），與先進資本主義國的情況比較仍屬落後（這些國家內的形勢亦不怎樣使人羨慕），不過，亦想提一些意見來幫助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必須指出，再分配方面的鬥爭與分配層面的鬥爭是需要互相配合的。圍繞政府收支的糾紛屬於前一種，而工運的發展、勞資關係的爭持、以至集體的討價還價，則是後一種的主要表徵，香港政府的「再分配」措施對各階層的「分配」狀況無大改善，足證分配鬥爭的進展不大。分配鬥爭的性質比較區域性，不似再分配鬥爭那樣為社會整體所注目。過分倚重壓迫政府通過公共政策來改變某些階層的福利，效果是有限度的，特別是當那些階層與直接對手的抗爭未有一定成就之前，因為這會招惹到其他（那怕同時是「受壓迫」的）階層的嫉忌，政府很容易將問題裝扮成爲一個「零和遊戲」，而保守勢力亦會唱和。大部份西歐國家與美國在七十年代末期開始大右傾，與之前十多年的「福利主義」潮流不無關係，中下階層只管鼓吹政府介入提高福利，而不着意促進工運、擴大聯盟及發展全面的殊途政策，終至互相傾軋，利益團體對抗壓力團體，種下了右派復興、「自由放任」思想再當道的禍因。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政府開始要面對無可避免的財政困難，我們一方面自然要繼續為低下階層爭取以及保衛權益，但另一方面亦必須留意社會氣候的變化，以免重蹈歐美的覆轍。「衝勁之外，我們還需要有智慧。」基本上，打好分配領域的實力基礎是必要的。

長遠來說，參政不同於爭取權益，我們始終要擺脫被動的防守

態度，拉廣戰線，擴大連繫層面，提出正面的、全面的主張，才可能成爲社會真正的主人翁。

誰在吃免費午餐？

這些日子常常掛在保守派的經濟學家口邊的一句說話是：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孤立來講，這句話自然毫不妥之處，它根本就是「自明之理」（truism），午餐是需要運用資源來生產的，你不必付出費用便可取得，只代表費用由別人代支而已。不幸地，一部份的保守派人士似乎習慣了把這些簡單的「自明之理」無限地上綱，這句說話竟然變成了攻擊社會福利和再分配政策的口號，而且通常不加解釋，好像口號本身就是「理性」的化身一樣。

表面上，老弱傷殘或低收入階層接受各種福利津貼或享受各種廉價服務，是免費地「佔用」社會上的資源，有違公平和自由競爭的原則。問題在於，我們棲身其間的到底並非一個「純理性」的、冷酷無情的、單懂計算的機械世界，人皆有惻隱之心，使不幸的成員的生活可以獲得一定的保障，絕無理由不能成為社會的集體目標之一，經濟增長率不應掩蓋一切。

不過，這只是一個次要的論點而已。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深究一下低收入階層為何會收入低，問題便不再這般簡單。保守派經常強調「平等」的只應是「機會」，而不應是「結果」，但實際上，社會上各階層的成員所面對的「機會」，又是否「平等」呢？一個街邊小販的兒子自然有「機會」成為一個醫生，但與一個醫生的兒子比較，大家條件是否一樣？實在不言而喻。保守派由於缺乏